

Column

■铭心之论

人类的历史说明，如果要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或者收入差距较小，或者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大。而当代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流动性却越来越低。为提高劳动收入占比，除了减税和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调整是更为重要的政策取向。具体说来，是实现三个方面的转换：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关系型社会到规则型社会、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

◎陆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当今世界，收入趋于不平等已成全球性现象，而这个趋势的背后，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简称“劳动收入占比”）引人注目地持续下降，这事关人类福祉。在中国，近十多年来，劳动收入占比也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下降之势，2003年以后降幅更大。现在，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仅40%左右，已跻身于劳动收入占比最低国家之列。

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与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了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y change），其结果是，制造业里的大量常规岗位被数字化的机器所替代。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全球化的浪潮又使得国家间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和商品的更为自由的流动，劳动力虽然难以流动，但资本和商品的流动却间接地加剧了劳动力间的竞争。与此同时，全球化真正使得资本实现了空前的“联合”，借助其高度流动性，资本在选择投资地时获得了更强的谈判能力，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趋势始于1996年，而这刚好是劳动力市场出现剧烈的结构性调整的时期。9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进城务工，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再加缺乏适当的劳动保护，民工工资在2004年之前的十多年里几乎没有上升过。而1996年之后，城市开始大规模的企业富余职工下岗分流，又对劳动工资产生了进一步的向下压力。

正是一系列扭曲劳动力市场的因素不断加剧了劳动者的弱势。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制定本地区发展政策的权力，地方官员的考核又是基于GDP的增长和招商引资，于是造成各地政府都过于偏重经济增长而忽视了收入均等的目标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在关系社会里，社会关系网络在影响人的收入和福利时有重要的作用，而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公权力又嵌入到市场经济和关系社会里，加剧了社会不公。当资本拥有者更能够借助于社会关系和行政权力而获利时，劳动弱势的局面就更为恶化了。在城乡分割下，农村居民在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体系里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而在城市内部，没有户籍的外来劳动力又受到了各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正在向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转化。

除了劳动相对于资本的弱势以外，政府税收在国民收入当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也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中国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自90年代以来便处在上升趋势之中，2003年以后，增长幅度更是惊人。其中，来自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所得超大幅度增长，被认为是由政府通过土地租金的垄断收益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就难怪国人一再呼吁政府应适度减税，甚至通过土地所有权的改革来让社会公众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了。

减税，特别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无疑是提高普通者实际收入的重要手段。相比之下，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对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却可能成为一着险棋。如果土地所有权改革的结果是使得资本拥有者能够更多地拥有土地，从而获得土地的租金，这完全可能使资本借助于土地有限供给的属性，谋得进一步的强势，反而对缓解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趋势不利。相比之下，在现阶段，更为稳妥的举措，笔者以为是可以通过公共服务的方式来让民众分享政府的财政收入，特别是通过公共服务的适度均等化来改善普通劳动者的福利。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与减税和土地制度的改革相比，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调整是更为重要的政策取向。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的：首先，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随着私人部门的快速成长，当代中国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的需求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强了。同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政府在处理复杂市场信息时的劣势越来越明显。因此，中国应适时地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将政府职能从直接参与经济建设调整为主要提供公共服务。其次，从关系型社会到规则型社会。未来中国需要加强立法与执法，加强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特别是要防止私人关系与公共权力的结合导致腐败。而其中，重中之重则要防止资本与权力的结合，避免权力的租金向资本的租金转化，加剧资本市场的非竞争性。正确的政策方向应该是进一步打破行业进入的壁垒，通过加强资本的竞争来相对降低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三，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未来中国既要通过移民推动空间意义上的城乡融合，还需要在农民进城后，加强原城市居民与新移民的社会意义上的融合，最终通过农民和城市新移民获得更多参与决策的权力来推动政治意义上的城乡融合。

人类的历史说明，如果要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或者收入差距较小，或者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大，而劳动收入占比的持续下降表明，普通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地位有所恶化。凡是一个社会出现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时，总是会通过一些方式来实现社会的结构性调整。方式之一是“用手投票”，并且借助这一民主机制来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的政策措施。方式之二是“用脚投票”，今天的中国出现了一些高收入者因为担心国内不安全而移民国外的现象，实际上就是一种“用脚投票”。方式之三是“用拳投票”，中国目前也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犯罪率也在上升，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也会影响社会和政治稳定，并且最终影响到可持续发展。

当代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同时，收入流动性却越来越低。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表明党中央和全社会决心通过“用手投票”的方式来平稳地调整其政治和社会结构，以适应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排沙简金

中铝之后，下一个是谁，快上！

——把外储变成国际一流公司股权，参与全球经济才是正道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万名媒体记者、编辑齐聚北京。此前被妖魔化的中国，恢复了其本来的面目。西方人震惊了：原来中国是这样的！

他们从奥运开幕式中，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激情和想象力，见证了正在崛起的中国力量，看到了一个经济大国的底气和气象，看到了中国人走向未来的自信。

今天是过去的积淀，未来是今天的延伸。别轻视这些评论报道，别轻视这些难能可贵的口碑。当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这是最好的通行证。中国忍辱负重几年，花费了数千亿元打造出来的品牌资产，是不是会得到中国人的真心呵护，还是个未知数。一如花瓶，奥运品牌是易碎品。打造起来费工、费时又费钱，可是一旦落空，它就碎了。这需要中国人借奥运会好口碑的契机，扎扎实实做些实事。

政府管理部门千万别掉链子

奥运的火热掩盖不了中国经济遭遇的“冬天”。中国对于楼市与股市的政策一直处于徘徊之中。今年股市和楼市一起下跌，使中国经济遭受所不能承受之重。两者必救其一。

我们看到，美国大胆撕破了楼市泡沫，释放出次贷危机，却挽救了美国股市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为什么？怎么办？



■金融城事

同一个市场渐行渐近 同一种货币……

香港商户接受人民币，深圳出租车司机拒收港币，2008年以来，这种趋势变得日益明显，港币与人民币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港币何去何从呢？

在一定的区域内，采用一种货币还是保持多种货币并存的格局，历来有很多争论。但货币一体化似乎是个趋势。中国最早的货币一体化是秦始皇通过强力来推行的，统一货币的好处显而易见，一般等价物使得交易范围扩大，并且物物交换的同时进行的规律也被打破，货币可以让不同的交易者在不同的时间交换自己想要的商品和服务。货币一体化，相当于统一标准，这节省了不同标准之间进行转换的交易成本。内地与香港之间，两种货币，往来交易需要结汇转换，往往不仅耗时间，还需要搭上手续费，并不方便，因此出现两地用一种货币的想法大体是很自然的。

统一货币的梦想还出于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国”的认同。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出现了三类不同的国家，以英、法为代表的国家，以汉萨同盟、莱茵同盟为代表的城邦国家，和以威尼斯、佛罗伦萨为代表的城市国家。在三类国家中，城市国家虽然实现了内部的货币统一但没有扩展为统一的经济制度安排，而更多的是出于历史沿革的原因所造成的货币的路径依赖；而城邦国家内部没有实行货币统一；只有主权国家视货币主权为国家民族的核心主权。尽管当下已经出现不同的货币区，也有中国这样多种货币并存的现实。但似乎这种“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观念呼应了古老的统一想象，直到今天还根深蒂固，难以去除。

但交易成本和国家认同并不能成为货币一体化的理由，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的“最优

货币区”理论就是针对主权国家之间的货币融合问题的，也就是说，“最优货币区”理论实际上是超越主权国家的一种货币理论。这完全不同于之前所界定的城邦、城市和主权国家内部的货币形态。历史上，1857年曾经形成了德奥货币同盟，1865年在拉丁美洲出现了拉丁货币同盟以及1872年的斯堪的纳维亚货币同盟，但这些同盟在进入20世纪后相继解体。这是不是表明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另外一个乌托邦式幻想呢？

欧元之父蒙代尔1961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所谓最优货币区指的是地理相近的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组成一个对内进行货币联盟、汇率固定，对外实行浮动汇率的经济区。蒙代尔进一步解释说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高度流动的多个国家或地区是组成单一货币的最优货币区。这一“最优货币区”理论经由麦金农、艾默生等人的发展，最后演化成“一个市场一种货币”论。

同一个市场，同一种货币”的思想由艾默生和格罗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提出，他们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市场驱动的货币竞争已经改变了货币关系的空间组成，国家的货币垄断权遭到质疑。一个货币区的货币选择本质上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货币区的范围由实际的货币交易网络来划分。此时，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工具和价值工具，才开始真正服务于市场，而无论这个市场有多大，涉及多少个主权国家，只要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包括要素流动不受限制等，那么单一货币就是最佳选择。

这里蕴含的思想是，货币的有效使用不该由政府或国家来决定，而是应该由市场来选择。这一思想表明，判断港币何去何从的依据其

◎李华芳
上海金融法律
研究院研究员

实并不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第111条规定：港元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继续流通。港币的发行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第112条又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港币自由兑换，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障资金流动和进出自由。尽管《基本法》对港币的限制并不多，但《基本法》依旧确立了港元的法定货币地位。

不难发现，内地和香港虽然处在完全不同的体制下，但确立法定货币的思路却是一致的。都是基于政治考虑，而并不是基于市场选择。从目前来看，港币的去路与香港市场与内地市场之间的融合紧密关联。内地与香港之间目前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力流动，远远没有达到自由流动的阶段，所以目前维持港币与人民币并存的货币格局并不是大问题。

但内地与香港市场之间的交流正在加速。这既可能是香港感受到被边缘化的压力，进而主动寻求与内地市场的合作与交流；也可能是内地的要素和资本寻找海外出口所。不同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同一个市场正在逐渐形成。由此，货币一体化在未来也可能成为一个趋势。当然，港币转弱、人民币走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人民币取代港币，也可以采用新的货币名称。另外，货币一体化并非朝夕可致。欧盟的经验表明，法国、意大利等历史悠久的国家放弃本国货币而采用统一的欧元，都经过了不长时间的磨合。面对新格局，在不改变香港金融自由的前提下，修改《基本法》关于港币作为法定货币的相关规定，或许能切实反映内地与香港融合与发展所凸显的对货币一体化的需求。

◎王育理
管理专家，《经理人》商学院院长

中国企业要勇敢走出去投资美元资产

中国中小企业正遭受着严重的危机。我曾去跟长三角企业家交流，他们说中小企业现在遭遇“四把刀”（汇率、油价、材料费、人工费上升）和“一根绳”（信贷紧缩），经过深入交谈，我发现，情况不尽如此。

现在企业遭遇成本上升，遭遇资金链的问题，多多少少是一种“富贵病”。我们现在富了架子大了，我们臃肿了需要的营养多了。飞跃集团邱继宝，创业时是个技术员，还一个人背着缝纫机去闯交易会，被阻后跳墙进去。当时他一心盯着订单。现在却不顾市场盲目的扩大规模、扩大生产线。上那么多的生产线，建那么多园区，典型的富贵病。这是中国企业的迷失。

在今年倒闭的许多中小企业，大多都是生产能力过剩所致。这实际上不是微观个案，而是一种整体景象。以至于兰德公司在最近的报告中，把中国金融体系的混乱归结为生产能力的过剩。

在美国次贷危机逐渐见底时，美元也停止了疲弱的走势开始走强。美元从强到弱再到强，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此

所谓“美国全球放羊，全球剪羊毛”的过程。美元疲弱时，美资就奔涌而出全球放羊。美元强势了，美资就开始撤回到处剪羊毛。有判断说，现在进入了5年美元强势周期，美国人又将开始新一轮的“全球剪羊毛”了。越南金融危机就是“剪羊毛”的一个牺牲品。

奥运效应将很快消失。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在国内监上生产线、打价格战，不如把握住强势美元刚刚起步的时机，果断走出去投资全球一流公司。对一个资源贫乏的大国来说，把美元外汇储备转变成沃尔玛、苹果、惠普、微软、IBM、思科、德州仪器、可口可乐、强生、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米塔尔、摩根大通、高盛、汇丰、索尼、丰田、诺基亚等一流公司的股权，可能具有更多价值。

不怕出错，就怕错过。走出去投资美元资产，参与全球经济才是正道。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巨大市场的庞大订单，是中国公司走出去的最好通行证。大型资源型公司、一流消费类和制造类品牌，特别想分享中国的高速增长，中国公司正可以投其所好凭借手中的订单，反向投资其母公司。别等着中铝一家增资力拓，中国投资者和公司都可以去投资力拓、必和必拓等资源公司，如何？

■江户物语

日本“一亿中产”陷入“滑梯社会”

◎陈鸿斌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室主任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收入分配相对平均。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既没有太多的超级富翁，也基本没有赤贫阶层。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说，“一亿国民皆中产”。

在战败初期，日本全国到处都是没饭吃、没工作的穷人。但经过战后复兴和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很快成为经济大国。由于高就业率和相对平均的分配，多年来日本人始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过上好日子”成为日本社会普遍的意识。由于贫困几十年来在日本都不成问题，所以日本就连贫困线标准也没有划过。

但世事难料，在泡沫经济破灭后，贫困现象再度出现，近年来则日益引起日本全社会的强烈关注。按照经合组织2006年一份有关日本经济的调查报告披露，日本工作年龄人口中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一半的人数占13.5%，仅次于美国的13.7%，在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中居第二位。这一报告使日本全国深受震惊。前些年，日本各种各样的“结构性改革”非但未能使经济有所改善，反而加剧了生活水平的两极分化。随着“终生雇佣制”的废除和失业率的上升，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无家可归者剧增，目前已达数万人之多。企业则迫于严峻的竞争形势，想方设法大量裁减正式员工，尽可能聘用“非正式员工”，以此来减少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开支。而此举造就了日本社会庞大的“贫困就业队伍”。从2002年至2005年短短3年时间，日本全国就减少了180万正式员工，这180万人就面临着贫困的威胁。目前，15岁至34岁年龄段的非正式员工已超过600万，每年还在迅速增加。对广大企业员工来说，只要一着不慎，就会坠入贫困深渊。而一旦成为贫困大军队伍中的一员，则很难再摆脱窘况。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说，日本已陷入“滑梯社会”，一旦滑下去就很难再爬上来。

如今，日本各职业介绍所每天上午一开门，就会涌入大量无家可归者和失业者，那场面比酷暑季节的医院急诊室还混乱。有时甚至上百人争抢一份一天的工作。因为尽管管一天，可运气好的话可挣个1万日元，这可解决好几天的生活费呢！每周二是职业介绍所的电话接待日，这一天接电话的人几乎没有喘息工夫，因为找工作的人实在太多而工作机会实在太少。

按照日本目前的生活水平，一个三口之家孩子就读幼儿园，年收入低于300万日元，生活就很艰难。而日本政府目前实施的生活补助标准为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家庭，由此不难想象，这些家庭的生活是何等艰辛。据统计，目前日本全国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多达1000万人，占到全国就业人员的六分之一。由于目前日本各地方政府均面临极为严峻的财政状况，所以都在想方设法减少开支，于是各地对补助生活困难的家庭就非常苛刻。除非医院证明丧失劳动能力了，否则失业者是无法领取生活补助的。有些人甚至连补助申请表都领不到，其理由是你可以通过就业来改善生活状况。但问题是工作根本不是那么好找到的。所以那些生活无着的人们在无法缴纳房租后，只能加入无家可归者的队伍。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领取生活补助的家庭还仅为60万户，1999年增加到70万户，2001年达到80万户，2006年则猛增为108万户！在90年代后期日本全国没有任何积蓄的家庭仅为10%，2006年这一数字已迅速增加到22.9%。在战后高速增长年代成长起来的日本人根本无法想象，有一天会困窘到没饭吃，可如今饿死在日本已不是什么新闻了，甚至有母女一起饿死的！前不久日本媒体报道了一名39岁的男子，其全部财产居然为100日元！而在东京最低小时工资也在800日元以上。收入下降了，房租或房贷是固定不变的，要压缩开支就只能节衣缩食，一些儿童因出现营养不良的状况。这使得许多日本人产生了“夕夕是何年”的喟叹。

如今，日本每三名企业员工中就有一人是非正式员工，而这群体大多是很难享受社会保障的。例如日本就有这样的规定：养老保险的对象是每周工作20小时以上，可望工作1年以上者。而很多非正式员工今天不知明天会不会有工作，那里能享受社会保障。另外，从失业保险来看，其投保对象必须在最近两年中缴纳了1年以上的失业保险。可打短工的人又怎样缴纳失业保险呢？连医疗保险也规定工作期限在两个月以上，其工作时间大致是正式员工的四分之一。可不少企业为了免掉这部分开支，故意将工作时间控制在四分之一以内，这就将许多打工者排除在医疗保险之外。

此前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出现工作的人养不活自己的问题。在过去，只要进了一家企业，员工就可以受到职业培训，就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住房补贴，其功能应该说是完善的。可如今时过境迁，无论你怎么努力，也许都无法解决生存问题。这对多少年来享受了社会平等的日本人来说，情何以堪！由心理冲击所形成的社会震荡，正在日本列岛不断扩散。